

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徐有威¹, 张 胜²

(1. 上海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44;
2.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备战为中心开展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两个组成部分, 对新中国国防、工业、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的早期研究多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中, 近年来则有明显进展。这些研究呈现出多面特征, 对其加以总结将丰富学界关于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和理解维度。

〔关键词〕小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国外学术界述评; 后小三线建设时代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3. 04. 014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备战为中心开展的三线建设由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两个部分组成, 对新中国国防、工业、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小三线建设系各省区市的后方战略基地建设, “旨在生产团级以下轻兵器, 武装民兵和地方部队, 战时支援野战军作战”。^{〔2〕}基于三线建设的国防备战目标,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三线建设才走入公众视野, 相关史料开始公开, 研究得以推进, 而国外学术界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3〕}早期小三线建设相关研究往往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之中, 近年来, 国外关于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日趋丰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三线建设研究

已有梳理, 但有关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的总结寥若晨星。^{〔4〕}本文拟就 1988 年国外学者第一次提及小三线建设为起始, 直到 2022 年这段时间内, 国外学者对于小三线建设研究予以梳理和评析, 以此丰富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和理解维度。

一、关于小三线建设的基本认知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国外学者在三线建设研究的框架下, 对小三线建设展开评述。伴随史料的丰富和国内小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化, 国外学者对小三线建设的认识不断加深, 其基本概念、决策动因和建设项目是国外学者普遍关注和研

作者简介: 徐有威,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胜, 历史学博士,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 2022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上海小三线企业军转民研究(1979—1988)”(2022ELS006)的阶段性成果。

究重点。

(一)对小三线建设概念的基本认知

国外学者从建设目的、建设区域等层面,对小三线建设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

第一,围绕小三线建设国防备战目的对其内涵展开研究。澳大利亚学者周庆生(Zhou, Qing-sheng)认为,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建设区域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实现国防目标为中心,确定了国家领土的三条战略线,并决定加快建设三线。国家三线通常被称为“大三线”,而省级三线通常被称为“小三线”,^[5]进而可以将省级三线地域开展的国防建设视为小三线建设。美国学者柯尚哲(Meyskens, Covell)则明确将小三线建设定位为各省的“军工综合体”建设。^[6]日本学者吴晓林认为,小三线建设是“地方工业化的一环”,即所谓“地方政府主导的小三线建设”。^[7]美国学者大卫·巴克曼(Bachman, David)提出,中国国防工业分为三个层次,小三线建设构成了最底层,为地方战略防御提供轻型步兵武器和战术通信设备。^[8]

第二,基于三线建设区域特征,对小三线建设内涵作出阐释。英国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Bramall, Chris)以发展历程和建设区域为界限将三线建设划分为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沿海省份创建的军事工业基地即是小三线建设主要内容。^[9]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梳理了小三线建设从决策初期计划建设“一、二线后方基地”到“各省都要建后方基地”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在相关省内或附近山区开展的后方基地建设即为小三线建设,与之对应的即是中央部门推进的三线建设,也被称为“大三线建设”。^[10]

以上研究还兼及小三线建设项目、管理体系的探讨,较为直观地揭示了小三线建设的基本内涵,亦为我们全面认识小三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总的来说,国外学者普遍认同小三线建设是省一级的三线建设,以国防备战为主要目的,并与国家层面的大三线建设衔接、互补。

(二)对小三线建设决策动因的分析

如前述,小三线与大三线建设同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将两者建设决策动因割裂考察。国外学者对于宏观三线建设的决策研究较为深入,一般认为,建设目的是出于中国国防安全的考量。三线建设所蕴含的经济、防修反修目的亦被国外学者关注,但不被看作主要决策影响因素。

较多学者认为国防安全因素决定了三线建设的决策。持此观点者以美国学者巴里·诺顿(Naughton, Barry)、杨大利(Yang, Dali)、马润潮(Ma, Laurence J. C.)等人为代表。巴里·诺顿是最早关注中国三线建设的国外学者,他认为,向三线地区大规模转移资源是中国决策者对紧张周边局势的反应,而引起中共中央考量开展三线建设的直接触发点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11]杨大利提出,尽管三线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整个三线建设是由军事而非经济因素决定的。”^[12]马润潮等人认为,三线建设时期的国家投资取决于国家安全考量,而不是对经济效率或区域发展平衡的考量。不过,作者也提出:“这种投资的时间和空间配置是国内和国际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13]樊菁婷(Fan, Jingting)等人亦持有类似观点。^[14]

柯尚哲认为影响三线建设的主要因素是军事防御,并具体指出是为防止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威胁。^[15]此外,丸川知雄还注意到三线建设的军事防御以及国内政治等层面的影响因素。^[16]亦有学者侧重从经济角度考察三线建设决策的影响因素,日本学者吴晓林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三线建设在做好战争准备和长期经济建设同时进行的方针下,以建立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到军事工业的大规模产业体系为目标”。^[17]韩国学者金东河(김동하)从国家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角度对三线建设决策展开了分析。^[18]

国外学术界对于宏观三线建设决策的探讨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小三线建设的背景和语境;

而国外学者对小三线建设决策展开的具体分析则更利于我们理解小三线建设决策的具体动因和影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各有侧重:

一是基于军事防御与反修防修的双重因素展开分析。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üthi, Lorenz)聚焦越南战争和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思想两方面原因,对小三线建设决策历程展开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直至1965年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登陆的时候,三线计划开始扩展至各省,成为特定的军事防卫准备,即小三线。同时,他关注到中国学者董宝训的研究,^[19]肯定了国内意识形态问题(反修防修)对于小三线建设的推动性作用。^[20]

二是强调军事防御因素。柯尚哲认为,在越南战争时期,三线建设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性国防建设项目。在三线建设问题上,中共领导人重新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巨大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社会和经济以军事化为中心,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国外敌对力量突然袭击。如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本土,他们必须突破第一、第二和第三线的三级战略地带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而这一过程中又必须应对驻扎在诸多省份山区由小三线战略基地提供支持的地方民兵的抵抗。^[21]换言之,中共开展小三线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可能发生的区域内军事斗争提供武器装备。

三是基于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理解小三线建设决策问题。吴晓林认为,小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核心之工业化战略的具体内容之一。彼时工业化政策是对“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模式、“二五”计划时期大跃进模式以及调整期中央集权性规划管理模式的否定探索。小三线建设以及大三线建设、五小工业、电子工业部门培育、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等均成为了这一工业化的中心内容。^[22]显然,小三线建设研究不应忽略其经济目的。

四是侧重探讨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影响。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Lewis, John W.)等人在1991年即基于《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资料指

出,毛泽东要求建设小三线是基于应对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考虑,因而地方性的小三线建设得以推进。^[23]其研究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小三线建设是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推进的结果。

(三)小三线的建设项目与具体内容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就小三线建设的项目内容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尚有一些不同认识,主要集中于常规兵器工业生产以外的项目。吴晓林认为,小三线不仅以轻武器等小型军事工业为中心展开建设,还包括炼铁厂、煤矿、发电厂、机械厂等相关工业设施,旨在形成国家新的工业基地。^[24]丸川知雄则认为小三线建设内容还包括钢铁、机械、煤炭、电力、交通等领域的项目。^[25]2020年,丸川知雄进一步以上海小三线建设为案例,关注到其生产内容还包括雷达等电子产品。^[26]

实际上,小三线以地方军事工业及其配套生产项目为中心,建设了大量的企事业单位。仅就常规兵器工业探讨小三线建设问题则不免有所局限。上海小三线建设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案例焦点。一方面,上海小三线建设相关资料的整理比较成熟;另一方面,上海小三线建设是最早被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的案例之一,有着丰富的研究基础。但其中的相关问题,不同学者亦存在各自的见解。例如,巴里·诺顿在1988年即指出,上海在皖南拥有57家小三线企业。^[27]丸川知雄则提出,安徽皖南建设的上海小三线企业是54家。以上学者对上海小三线企业数量认识的不同亦体现了这些学者对小三线认知的不同。究其根源,小三线单位的国防备战与保密特性不利于国外学者对相关项目开展全面考察。事实上,小三线建设除包含地方军工企业,还建设了大量的包括医院、学校等配套单位和设施,以及电子通信、机械维修等项目。大卫·巴克曼认为,军工项目仅占小三线建设核心地区基本建设资金的30%。他指出,虽然小三线军工企业有相应的数据,但小三线建设的电子和其他国防工业单位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28]

二、宏观视野下的小三线建设历史阶段 及相关问题探讨

小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建设历史阶段的研究,亦无法仅以小三线自身开展分析。国外学术界侧重围绕对包括小三线在内的宏观三线建设发展高峰展开探讨。例如,巴里·诺顿将三线建设分为1964—1966年和1969—1971年两个发展阶段。^[29]樊菁婷等人与之认识类似,认为三线建设经历了两轮投资高潮,第一波浪潮在1965年左右达到顶峰,并指出当时为了应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项目被启动;第二波浪潮在1970年左右达到顶峰,这是对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应对之举;1972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对三线地区的投资急剧下降。^[30]亦有国外学者将1966—1971年的三线建设视为一个完整的高峰建设阶段。^[31]

大部分国外学者倾向认为宏观三线建设经历了两个发展高峰阶段,并体现出不同特征。首先是项目建设成效的不同。巴里·诺顿通过比较指出,第二个投资高峰阶段项目施工的协调性远低于第一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1969—1970年间中央相应规划机构的削弱,以及这一时期规划设计工作的质量普遍较低。此外,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在1970年末和1971年对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这也影响到了三线的建设项目。^[32]其次是聚焦“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柯尚哲不仅关注到“文化大革命”在一定阶段内阻碍了三线建设的历史事实,还强调在1969年以后,防止修正主义又被作为一种“重申政治秩序的方式”,推进了国家军事备战与三线建设。^[33]

在经历两次投资高峰后,三线建设由于中美关系缓和、规划部门职能弱化、选址条件较差以及过大的建设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支撑范围等原因,其投资逐步减弱。然而,三线建设虽进入低谷期却并未彻底停滞,对于这一现象,

国外学者给出了多种解读。巴里·诺顿认为,在1972—1978年里,三线建设战略的完成仍然是决策者的优先考虑事项之一。其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仍认为苏联是一个充满敌意和威胁的大国,因此,领导层高度重视后方基地的存在。此外,数十亿元人民币已经投入到三线,虽然一些项目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但其他项目如果完成,仍将产生经济效益,这也需要进一步投资。^[34]吴晓林与之认识相似,他提出三线建设没有终止的原因有两点:世界规模的战争仍可能存在,中国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有在相关地区构建资源型经济发展体系和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性。^[35]杨大利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首先,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引发新的战争恐慌;其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决策层都很难让项目仅完成一半;最后,经济决策的权力下放与分散,使得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很难控制投资总规模,各地方具有较高自主权将其控制的资金用于三线建设项目。^[36]丸川知雄则认为,三线建设持续不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于四人帮的斗争,由此导致中央政令不统一,很难采取果断措施终止三线建设。^[37]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军事防御是三线建设投资在1972年以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地区经济体系建设与工业化发展、管理机构乃至中央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都对三线的持续建设产生了影响。尽管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国外学者对三线建设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认识与国内相关学者大体上是一致的。^[38]通过相关研究,我们亦可窥见:小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两轮投资高峰;1972年以后小三线建设的投资逐步减弱,但并未停滞。其内在逻辑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防工业建设以及为应对时刻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局势而作出的因应,其中,国家安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因素亦具有影响作用。尽管小三线建设的发展阶段与宏观三线建设近趋一致,但在相关发展阶段中,小三线建设管理机构的变化却有着自身

的特征。

丸川知雄早在1993年即就小三线建设管理机构变迁展开了考察。他的研究涉及主管小三线建设的军事部门、政府部门乃至相互间的关系调整等问题。^[39]近年来,他以上海皖南的小三线建设为案例,进一步揭示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管理机构的独特变迁史。^[40]吴晓林与丸川知雄关于小三线建设管理体制的调整变迁历程及影响因素的认识较为一致。他考察了小三线建设管理体制调整过程中,军事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协调问题,认为军事部门在小三线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41]

大卫·巴克曼详细梳理了广东小三线建设管理机构的发展历程与调整脉络,并就党的组织机构在小三线建设初期的作用问题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广东小三线建设早期是由中共中南局、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武汉和广州军区共同规划,中南局和省级政府中均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最初武汉和广州军区在制定小三线建设规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后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机构接管了小三线建设的规划。1964年10月以后,各省取代了军区成为小三线的主要规划者。^[42]

柯尚哲注意到了小三线建设运行、管理过程中,所在地区的县级政府部门的具体作用。他认为,相关县城运营着支援三线建设办公室,以组织当地劳动力和筹集建筑项目用品。国防工业办公室与省市级的政府机构一起为小三线建设履行同样的职能,同时再依靠县级机构将当地资源用于工程建设。^[43]

小三线建设乃至宏观三线建设历时十余年,经历了复杂的国家政治、文化思想、经济发展变迁。尤其,小三线建设主管机构不断变化,对其不同建设阶段的历史考察,更应置于国家计划经济、政治体制背景下,充分考量其建设目标、实现意义以及管理体制变迁,同时还应关注企业自身的能动性与发展张力。

三、改革开放与小三线建设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小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学术界公认,全国层面的小三线建设初步调整阶段是在1979至1984年间,以军转民为中心。1984年8月,小三线建设进一步调整政策出台,标志着其进入二次调整阶段。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概念^[44],用以解释改革开放以及调整政策出台以后小三线建设迎来的历史新时期。国外学者尽管并未专门指出这一概念,但对相关时期的小三线建设调整历程,企业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考察。

(一) 改革开放初期的小三线建设调整

小三线建设军转民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卫·巴克曼对广东小三线单位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史有较为深入的梳理。他认为,在改革时期,三线企业大多转为了民用生产企业,大部分转为民用生产的企业要么保留了最低水平的国防生产能力,要么有能力恢复到更高的国防生产水平。他还提出,尽管1978年底开始改革和调整,但国防军工企业向民用领域的转变模式不尽相同,采用的方法亦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将国防企业从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的监管中“解放”出来是三线企业转型的最后一步。他以广东为案例,揭示了小三线企业调整的复杂模式,包括“关、停、并、转、迁”等多种方式在内的调整方法及职工安置、企业资产股份制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等不同发展情况与特征。^[45]丸川知雄以上海小三线企业为案例展开探讨并指出,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军费被大幅度压缩,武器的订货量急剧减少。尽管,上海小三线建设的企业在上海市主管局的帮助下谋求转型发展,但上海小三线单位的生产到1982年为止仍持续减少,整体亏损,甚至引起了工人的不满。他分析原因认为,如果要制造民用产品,在山区继续设厂并没有意义,“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方针,给企业交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障碍。^[46]

较多国外学者聚焦于改革开放后小三线企业的外贸问题展开研究。约翰·刘易斯从武器出口的角度指出,宏观三线建设的调整促使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了国际军售业务,三线调整使中国成为了武器出口国,向国外出售武器成为获得发展资金的一种明显方式。^[47]丸川知雄同样认为,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局势以及我国军工外贸的发展推动了部分小三线企业军工产品在一定阶段内达到了生产顶峰。他推测上海小三线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均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因为上海小三线制造的武器在中越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得到使用。^[48]这亦利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三线建设的调整政策明确规定“不再保留小三线军工生产体系”,这对国外相关学者认识小三线调整历程产生了一定影响。吴晓林认为,三线企业的选址调整、生产结构调整正式开始是在1984年以后,小三线则采取了“取消小三线军事工业”的解决方案。^[49]巴里·诺顿提出,1985年秋季,三线建设企业调整计划被确定后,数量不详的工厂被关闭或者被兼并进入其他工厂。^[50]不过,这方面的相关研究由于受到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局限,未能展开更为量化、细致的深度梳理。

(二)调整后的小三线企业发展及原建设地区经济、社会建设

就企业本身而言,大卫·巴克曼关注到改革开放后,部分小三线企业成为合资公司的发展历程。他指出,随着经济改革,国防工业化的新基础可能正在形成,特别是在电子领域,广东在这一方面走在前列,不少合资企业开始出现。^[51]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改革开放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丸川知雄梳理了上海小三线搬迁以后,原建设地区利用小三线移交资产发展工业企业的历程和积极意义。他列举了诸如贵池县小三线工厂被当地民营企业收买设备,改为缝纫机、机床、轴承等工厂的案例,以及东至县的化工厂设法保留企业原型的努力,并最终进行

了股份制改革,至今作为以硝酸为中心的化学原料制造商,生产规模扩大到移交前几十倍的案例。^[52]这些实证研究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认识小三线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时代价值。

就企业对地方经济建设影响而言,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其积极意义有限。克里斯·布拉莫尔认为,小三线和大三线建设一样,在改革开放后,其工业建设基础对所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他以广东北部韶关地区的小三线建设为案例提出,韶关县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在1982年后仅为14.7%,远低于广东农村的平均水平,因而得出结论:1978年后,三线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不佳。相反,该省的增长极是以广州、深圳和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包括劳动力等在内的要素流动性似乎常常弥补了先前农村有限的工业化。^[53]樊菁婷等人认为,三线建设对当地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并在减少区域不平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他们亦明确指出,三线建设并未提高地区总的生产效率。^[54]

部分国外学者直言小三线建设的调整是失败的。大卫·巴克曼分析了广东小三线建设转型失败的原因:国防工业系统这一最底层的企业(小三线企业)众多,因此即使在省级层面也过于多余;生产标准化的武器,与研发系统缺乏联系;位于偏远地区。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企业成功转型的可能性很小。^[55]

近年来,不少国外学者还基于企业调整与职工生活、小三线建设者心灵史等角度对小三线建设涉及的经济、社会问题展开研究。柯尚哲从宏观三线建设视角指出,年轻大学生毕业后要求参加三线建设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心中“听党话,跟党走”的信仰力量,这些学生对于能够参加三线建设具有很强的荣誉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年轻人参加三线建设。柯尚哲分析认为,国有企业的身份吸引,上级政策的指令性规约,甚至是有水分的宣传信息均对大

学生参加三线建设产生了影响。^[56]徐有威与加拿大学者王弋文在2022年出版的上海小三线口述史的著作中,收录了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回忆。该书着眼于上海这个最国际化的城市的三线工人,将他们关于三线建设、生活与工作的回忆翻译为英文并将其脉络化,展现了冷战时期中国与全球地缘政治变化背景下三线人的日常生活图景。该书的出版对于国外学者研究小三线建设及其建设者的心路历程,具有重要价值。^[57]

四、结 语

总体而言,在研究路径上,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从对小三线建设基本认知的宏观描述逐步过渡到以某一地区乃至某一企业为案例进行深入考察的拓展路径。在研究方法上,从以相关资料和既有成果的梳理转化为中心开始转向以一手史料、数据分析为范式的探讨。在研究资料上,国外学者对国内小三线建设出版物和研究信息的掌握越来越充分,中文新出资料很快能够同步至西方学界。^[58]在研究视野上,国外学者既关注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宏观国际局势对国内小三线建设、调整的影响,同时又基于新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政策变化甚至相关体制机制变迁的视角,对小三线建设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诸多面相展开分析,提出了较多新的观点。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式为国内小三线研究提供了诸多思考与理解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近年来,已经开始和正在培养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完成以三线建设(内容包括小三线建设)研究为中心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这些年轻的学者不仅梳理了三线建设史,还涉及中国工业化、改革开放和国营企业发展等问题,丰富了国外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史和新中国建设发展成就的认知。^[59]

然而,国外学术界对小三线建设研究由于史料不足、阐释倾向等原因,其研究成果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第一,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聚焦不足。尽管国外相关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进展,但对小三线建设的专论较少,大多数成果仍内嵌于宏观三线建设研究之中,特别以评述性探讨居多,缺少量化分析与一手史料支撑。部分研究未能很好厘清小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概念和内涵,以至于忽视了小三线建设与大三线建设的区别。

第二,对小三线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国外学者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侧重将其置于冷战格局背景下展开分析,缺少对小三线建设在国防、政治、经济等层面积极意义与价值的梳理,尤其是基于经济效益不足性的分析遮蔽了小三线建设的多重作用。同时,国外学术界尚未意识到三线建设历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力量及其激励作用,缺少深度的田野调查,造成对小三线建设的成效和意义认知的局限。

第三,对当代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关注较少。小三线建设虽已成为历史,但留下了诸多工业遗产而与现实并未脱离,目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已成为中国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相关学者基于不同维度对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概念、保护与改造利用路径进行了探讨。国外学者尚较少关注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未能综合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多维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对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开展综合探析、融合研究。

小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地方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普遍建在山区乡村,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建设、国防与外贸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下,其价值与意义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尤其没有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小三线建设研究深化和国内外研究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未来小三线建设研究应注重如下三种途径:首先,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应进一步加强。国外学界可以通过与中国学界的合

作,了解更多国内对相关问题的前沿研究,进一步与中国学者展开深度对话,并将小三线建设研究置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框架之内,了解中国的现状、发展脉络与未来方向。其次,拓展横向比较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并非只有中国曾在边远山区开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已在中亚地区、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推进过类似的工业化,相关学者对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政治影响因素的探讨亦颇具启发意义。^[60]在考察苏联工业建设史的过程中观照小三线建设研究亦可进一步拓展冷战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和思考维度。最后,应当关注小三线建设日常生活史。正如部分学者所论,三线建设所呈现的相关个人日常生活内容,包括政治、教育、婚姻、娱乐、医疗等诸多领域,亦将利于自下而上地理解作为世界冷战前沿的中国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多重影响,具有世界意义。^[61]

总之,国外小三线建设研究方兴未艾,继续推进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不仅利于国外学术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和内在理路,“讲好中国故事”,亦将为中外学界交流打开一扇窗口。

注释:

[1]关于国外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翻译问题,国内学者已有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参见秦颖、刘合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本文统一将国外学术界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如,“small Third Front”“minor third-line”“xiao Sanxian”“the small third front”“Small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the ‘little’ Third Front programme”等翻译为“小三线建设”。

[2]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1981年4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66-1-138。

[3]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参见 Naughton, Barry,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该文已被翻译出版,参见[美]巴里·诺顿(Naughton, Barry):《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徐有成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68-

299页。

[4]秦颖、刘合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Xu, Youwei, “Exploring New Frontie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41, No. 2, May 2020; 陆婷:《三线建设研究三十年变迁: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文献计量与定性分析方法》,《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徐有成、张程程:《2021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

[5]Zhou, Qingsheng, “Capital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its 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Vol. 17, Issue 2, June 1993。

[6][15][21][33][43][56]Meyskens, Covell,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4, 124, 26, 125, 10, 114 - 118。

[7][17][22][24][35][49][41]吴晓林,「毛沢東時代の工業化戦略:三線建設の政治経済学」,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第138、174、139、195、158-159、266、159頁。

[8]Bachman, David,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Guangd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9]Bramall, Chri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

[10][25]丸川知雄,「中国の“三線建設”」(I),「アジア経済」1993年2月号,第71、72頁。

[11]Naughton, Barry,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12]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2, June 1990。

[13]Ma, Laurence J. C., Wei, Yehua, “Determinants Of 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 1953 - 1990”,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Vol. 88, Issue 3, June 1997。

[14][30][54]Fan, Jingting, Zou, Ben,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52, September 2021。

[16]丸川知雄,「中国の「三線建設」再論——吴晓林著「毛沢東時代の工業化戦略—三線建設の政治経済学」」,「アジア経済」2002年12月号,第70-73頁。

[18]김동하, 중국의 3.5 계획 및 4.5 계획에 미친 비경제적 요인에 관한 연구, 中蘇研究, 제 40 권 제 1 호, 2016 봄, pp. 85 - 136。

[19]参见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0]Lüthi, Lorenz, “The Vietnam War and China's Third -

Line Defense Plann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4 - 196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0, No. 1, Winter 2008. 该文已被翻译为中文, 参见[加拿大]吕德量(Lüthi, Lorenz):《越南战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三线防卫计划(1964-1966)》, 徐有威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4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 第63-88页。

[23][47] Lewis, John W., Di, Hua and Xue, Litai, “Beijing’s Defense Establishment: Solving the Arms - Export Enig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Spring 1991.

[26][40][46][48][52] 九川知雄, 『計画経済下の中国における孤立社会—「上海小三線」における生産と生活』, 『アジア研究』2021年67卷2号。该文已被翻译中文, 参见[日]九川知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小三线”的生产与生活》, 徐有威等译,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7][32][34][50] Naughton, Barry,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28][42][45][51][55] Bachman, David,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Guangdo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29] Naughton, Barry,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The MIT Press, 2007, pp. 73 - 75.

[31] Rithmire, Meg Elizabeth, *The Political Logic of Spati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p. 87.

[36] 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2, Jun 1990.

[37][39] 九川知雄, 『中国の“三線建設”』(Ⅱ), 『アジア経済』1993年3月号, 第82頁。

[38] 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 第103-104页。

[44] 参见徐有威:《开拓后小三线建设的国史研究新领域》, 《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 李云、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以安徽池州为例》, 《学术界》2022年第1期; 张胜、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安徽企业发展研

究》, 《江淮论坛》2022年第1期。

[53] Bramall, Chris, “Path Dependency and Growth in Rural China Since 1978”,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Vol. 2, Issue 3, 2003.

[57] Xu, Youwei, Wang, Y. Yvon (eds), *Everyday Lives in China’s Cold War Military - Industrial Complex: Voices from the Shanghai Small Third Front, 1864 - 1988*,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高级讲师 Matthew Davies Galway 撰写该书的书评, 在英国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2023年第1-2期出版。

[58] Meyskens, Covell, “A Rich New Window In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Cold War China”, *Twentieth - Century China*, Vol. 47, No. 3, October 2022; Lüthi, Lorenz; Qian N. Zhang, Xu Youwei ed., “Koushu Shanghai: Xiaosanxian jianshe (Oral Shanghai: The Minor Third - Line Defense)”,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0, Issue 4, 2015.

[59] 代表性学位论文参见 Xu, Kaisheng, *Third Front China’s Industrial Program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3; Rithmire, Meg Elizabeth, *The Political Logic of Spati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Li, Ju,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A Third Front Enterprise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Binghamton University, 2012; Dong, Guo,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China’s Third - front Enterprises: Cases Study on Aosheng Group*, PhD Dissertation,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de Lisboa (Portugal), 2013; Zhao, Yameng, *The Relocated Workers and Local Farmers During the Third - front Construction in China: Identity, Expectation and Experience*, Master Dissertation, Kyoto University, 2019.

[60] Kassymbekova, Botakoz, *Despite Cultures: Early Soviet Rule in Tajikist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6, pp. 84, 102.

[61] 秦颖、刘合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